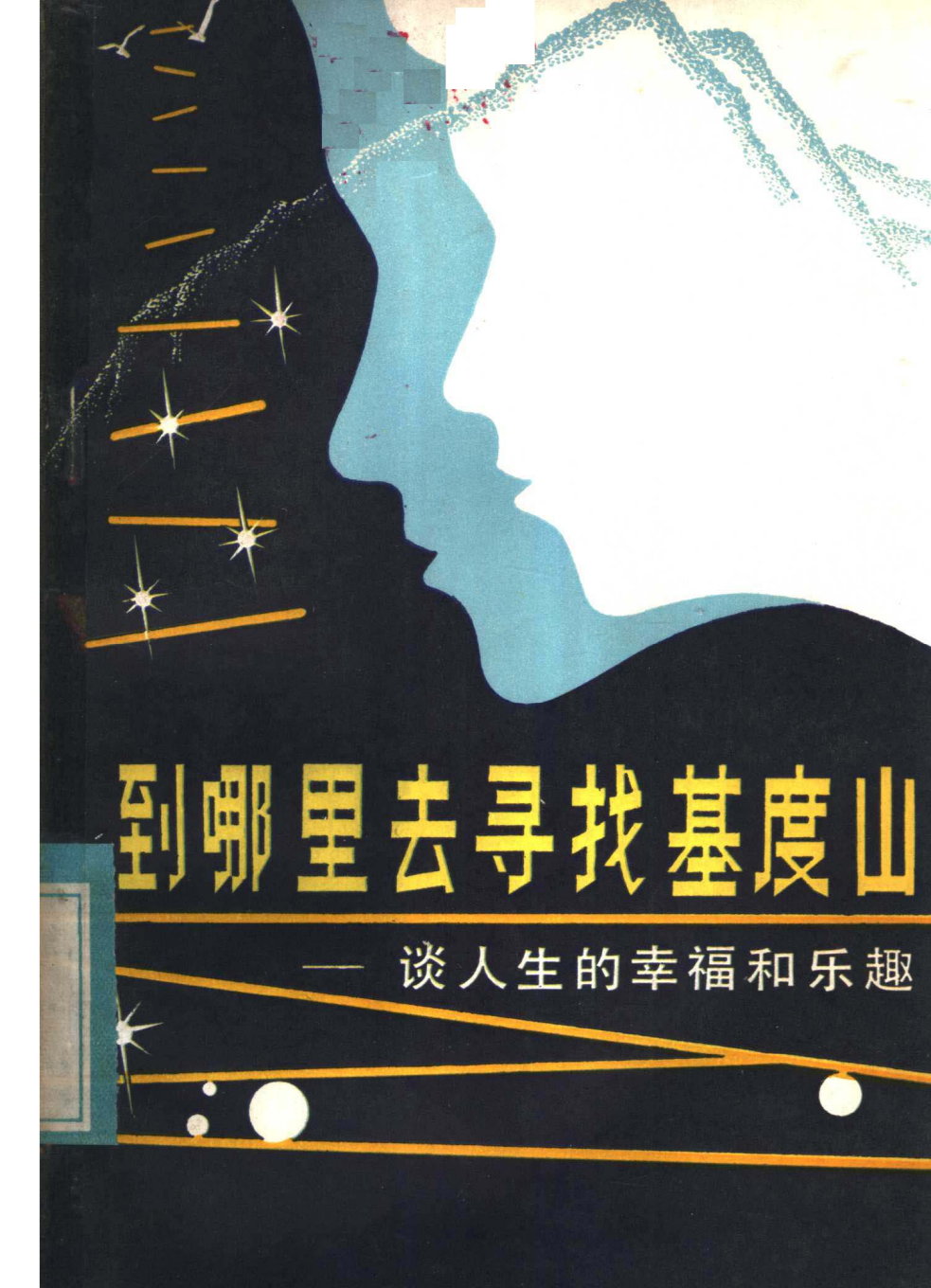




到哪里去寻找基度山

——谈人生的幸福和乐趣

到哪里去寻找“基度山”

——谈人生的幸福和乐趣

邵传烈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刘 纯 韩继海

封面设计：柴贵良

到哪里去寻找基度山

——谈人生的幸福和乐趣

邵传烈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双鸭山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4 6/16·字数80,000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600

统一书号：3093·280

定价：0.30元

目 录

到哪里去寻找“基度山”？	1
人生就是进击	7
把追求的目标升高	11
向“玉皇顶”挺进	16
让每盏灯都放出自己的光亮	20
“为自我”和“为别人”	24
略论“雷锋型”	32
乐趣是需要的函数吗？	37
“良心”问题	43
“尖子”自毁的随想	47
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	55
信仰的力量	59
报国须怀儿女情	64
“人才外流”的另一面	69
他们在等待什么？	73
灵魂究竟有没有？	78
扶正祛邪	83
从“人言可畏”论及嫉妒之害	89

不要轻率地熄灭生命之火.....	95
不要把自己看作一粒珍珠.....	101
请勿“热汤浇身”	107
“谈情说爱”四题.....	112
“兴这一套”质疑.....	121
从美的事物中找到美.....	126
心灵美是“四美”的精髓.....	131

到哪里去寻找“基度山”？

《青年报》曾经出过一个好题目，发动广大团员、青年讨论：到哪里去寻找“基度山”？一石投去，水花飞溅，引出了种种议论。有的说，这是青年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反映，无可指责；也有的说，这是思想堕落的开始，犯罪的根源往往在于此。究竟哪一种意见对呢？《青年报》的广大读者已经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里，我也想谈一点看法。

题目是从“基度山”引出的，那就不妨先谈谈“基度山”。时间对人类精神的创作是毫不留情的。它只宽容和保存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东西。一切肉麻的赞颂和声，都将会随着空气的流动而在空中消失，人世间的虚名也注定要烟消云散。唯有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才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声名。大仲马写的《基度山伯爵》，自公元一八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法国《议论报》上发表第一节起，就使成千上万的法国市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安睡过一个好觉。许多读者迫不及待地付钱给印刷厂工人，以便探听大仲马是否交付了下一期的续篇。时间过了一百多年，人们对《基度山》的感情，依旧是如此热烈。这说明人民群众是文学作品最有权威的评判者。不过，由于着眼点不同，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在今天有些青年人眼里，“基度山”这个名词，成了“金钱万能”的代名词，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

论：在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一个人的财富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尊敬。

这种看法，恕我直言：恐怕是没有真正读懂《基度山伯爵》这本书。

大仲马写《基度山伯爵》，据说是从当时警察局档案里一篇名为《金刚石和复仇》的材料中得到启发而写成的。大仲马后来写道：“这个故事就象是一颗隐藏在贝壳里等待着珠宝匠的珍珠。”但在小说里，大仲马把平民生活中发生的这个故事，移到了“上流社会”的社会环境中去。大仲马从邓蒂斯蒙冤这个浪花，以小见大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波涛。作家把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信念和反封建复辟的强烈情绪，注入到了这个曲折复杂、悲欢离合的故事中去。大仲马痛恨那些在七月王朝中红得发紫的人物：暴发户、追名逐利的小人、投机的银行家、作了大官的流氓无赖、在殖民地发了财的骗子以及变了质的将军们。“赏善罚恶”，这是小说的主题。大仲马通过邓蒂斯的复仇活动，严厉地清算了这些坏蛋：他让爱金钱胜于生命的银行家邓格拉斯在金融投机中一次次蚀本，直至彻底破产；他揭发以其高贵身世自炫的马瑟夫伯爵叛卖希腊总督的卑劣行径，使之身败名裂，他把以“铁面无私”执法者自居的维尔福作为杀人犯推上被告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仲马敢于以“复仇之神”的姿态，对那些做尽坏事而不受惩罚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施行我的法律”，对一切背信弃义和出卖行为作出残酷的报复，是难能可贵的。读《基度山伯爵》，似应首先注意到这一点。

有的同志也许要说，邓蒂斯的复仇获得成功，不正是通过“基度山”的宝库得以实现的吗？是的，邓蒂斯报恩复仇的每个环节，都是金钱起了决定作用。在大仲马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大仲马想不出也不可能想出别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平，只能幻想出一座人世间实际并不存在的“比金山还值钱”的宝山，以一笔“干干净净的金钱”来反对“每个毛孔都滴着血”的金钱，以一笔行善的金钱来反对作恶的金钱。有了这样一笔从天上掉下来的金钱，他就象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如果我们细细想一想这些情节，就不难发现，大仲马所设计的这座“基度山”，无非是作家在找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之前，虚构出的一种离奇的幻想而已。以便让千千万万的读者在松一口气之中，找到某种慰藉和寄托。这正是大仲马的历史局限性所在，也是这部小说思想上的瑕疵所在。

当然，在这点上，我想不必苛求大仲马。大仲马毕竟是生活在十九世纪时代的大仲马。大仲马可以在他的小说里宣传“金钱万能”的思想，那是这面镜子所真实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果我们能够于此认识什么叫资本主义社会，倒也不失为是一种收获。但是，把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天经地义”，也来个照单全收，真的以为有了“基度山”便有了一切，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立身行事，那就是舍本求末、适得其反了。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金钱已经不能主宰一切了。

话还得说回来。在今天，我们也不必讳言货币、金钱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要存在着商品和商品交换，货

币就不能取消。诅咒货币是大可不必的。我们也不应把钱与“资产阶级思想”划上等号。陈伯达之流在一九五八年导演的那出取消商品生产的闹剧，其中有一幕就是取消货币。这样的闹剧，比现代西方的“荒诞派”戏剧还不如。在今天，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往往是从经济收入的增加而体现出来的。如果是正常的按劳所得、多劳多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也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不必对“赵公元帅”磕头求拜。我们所不赞成的，是那种挖空心思地去想挖一座个人发财的“基度山”，从见钱眼开到见钱眼红，甚至不惜去从事转手倒卖、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门心思找“基度山”，到头来，“基度山”没有找到，自己的两只脚，倒很有可能会落到犯罪的泥坑中去的。

如果说，生活中可以找到“基度山”的话，那么，在《青年报》的讨论中，有几位读者的意见说得好：“基度山”在祖国的四化建设之中，“基度山”在事业和知识之中。作为当代的有志气的青年，应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旦这座“基度山”被找到了，开发了，取之不尽的物质财富就会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十亿中国人民就能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华民族将永远不会受人欺凌，而作为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的“我”，也会随之而大大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个道理就叫做“大河有水小河满”。有兴趣寻找“基度山”的青年朋友们，把你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难道不是更现实一些吗？

末了，我觉得还有必要补充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大仲

马笔下的“基度山”，那纯属于虚乌有，是永远也找不到的；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装满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度山”，打开最近一段时期的报刊，我们却时常可以见到。沈阳市退休工人莫京祥、王振兴、黄乃忠、王世学退休之后、谢绝高薪聘请，先后到辽宁省技协当顾问，往返于辽宁省各县之间传授技艺，为县镇企业的铸造、冷加工、热处理等方面存在的四百多项技术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全国商业劳动模范、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上海杨浦区酒家青年服务员郁季辉，被评为一九八〇年度区最佳营业员后，她用获得的四十元奖金，买了八筒糖果，送给店内八个独生子女。上海牙膏厂退休女工胡阿素生前省吃俭用，积蓄了人民币一万零一百二十三元，立下遗嘱，死后全部献给国家，苏州丽华知青丝绸厂青年工人杜芸芸，把继承的十万元遗产全部上交国家。在他们的崇高行动面前、金钱为之黯然失色！若问：在生活中，有没有比财富更引起人们的尊敬的东西呢？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先进的、崇高的精神和行动，闪烁着共产主义风格的精神和行动。人们称赞胡阿素、杜芸芸“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诚然是不错的。但我以为，金子的价值是可以由货币来计算的，胡阿素、杜芸芸那种一心为公的崇高思想，那是用十座“基度山”的珠宝也买不回的。富裕的物质生活，那诚然是一种幸福，但只有物质文明而缺乏精神文明，那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唯有两者兼得精神生活充实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

精神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决不否定精神的能动作用。恩格斯曾经

说过：“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冲洗一下那种“庸人”的“唯物主义”，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春风，吹遍今天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而极大地促进和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

人生就是进击

在生活之路上，各种挫折和困苦是会经常遇到的。比如，没有考上大学，或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或在工作中犯了错误，或未犯错误却受到了错误的处置，或恋爱对象突然绝情而去，或自学有成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或揭露了领导的过失却受到了打击报复等等。有的青年朋友问我：遇上了这样的问题和不幸，应当怎么办？

我想起了冯定同志说过的一句话：“人生就是进击。”我愿意把这句名言，奉献给那些在人生道路上遇到这样那样挫折和困苦的青年朋友们。

“人生就是进击”，这就是说，虽然生活的美酒对每一个青年来说，都应当发出同样的芳香，但是，人生的道路，从来就不是那么笔直而又笔直的，它不会象在西子湖畔坦荡如砥的白堤上散步那样轻松愉快。在生活中一帆风顺者当然也有，但为数并不多，而且也不会永久。如果在某个时期，美酒变成了苦酒，那么，最要紧的是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经过努力进击。人生的某些不幸和挫折，都是可以改变的。

这是因为，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有显赫的地位，优厚的待遇，而在于他有崇高的心灵、纯真的感情。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说过：“我的生活每况愈下，但它没有过错，因为我不仅没有跌倒，反而始终斗志昂扬。也就是说，生活中的每

一次下降，并没有使我退回到出发点。”（《圣西门选集》第1卷，第35页）圣西门这样说并非空论。他原是一个出身贵族的资本家，有一笔巨大的家产。但是，圣西门为了献身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三年中把十四万四千里弗的家产用得精光。当时，圣西门已年近五十，经济生活却每况愈下。他一贫如洗，有时依靠偶然的赠与度日，有时依靠临时工作生活，有时依靠朋友的援助糊口。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圣西门在自己的《自述》里写道：“现在，饮食只有面包和开水，工作的时候屋里没有生火，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两个星期。我把一切都已卖光，一直到身上穿的衣服，为的是支付我的著作的抄写费。”尽管如此，圣西门一点也没有泄气，他终于完成了多种论述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著作，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吸收了十九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

人生即要进击，就必须有一颗图强之心。图强必须发愤，要从心里迸发出那么一股子劲，时间的长河滔滔而过，人生中的黄金时代，转瞬即逝，可要珍惜呀！且莫在河边叹息徘徊。要激流勇进，扬帆竞发。一旦由于某种原因，虚度了年华，那也不要追悔莫及，而是追悔能及。战国时的苏秦说秦王不成，回到家里，“妻不下纡，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日子确不大好过。但是，苏秦在受到如此冷遇后，引锥刺股，发奋读书，终于学而有成，后来六国封相。理想总是和奋斗同胎而生。生活是创造者的艺术。不过，苏秦发愤的目的，无非是为“取卿相之尊”而已。这和我们今天追求

的两个高度文明的大目标相比，显然是低得多了。纵然如此，他还是取得了成就。如果我们树立了高远之志，同时又记住我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获得者容国团说过的名言：

“人生能有几回搏？”发扬这种敢于拚搏的精神，竭尽全力，搏它几回，是一定会有大成就的。须知生命的光辉不是靠空话，而是靠坚韧不拔的行动迸发出来的。在进退皆可的时候，人的精神状态，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振作起来，迎上前去，终将获得进展；消极颓唐，退下阵来，必然一事无成。

对于各种各样挫折、磨难，人们往往只看到受挫、困苦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另一面。对于逆境，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它，不要把逆境看得“一无是处”。拜伦说过：“逆境是达到真理的一条通路。”受点挫折，从磨练意志的角度来看，也许不无好处。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有几句话说得好：“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倜傥”也者，就是卓异出色的意思。记载在人类史册上不少闪闪发光的 名字，有不少是在年轻的时候忍辱负重，经过刻苦学习后刻写上去的。能上大学，固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不能上大学，就无法在学业上进取了。聂耳没有进过音乐学院，成了大音乐家；做过鞋匠的狄慈根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发明火车头的史蒂芬逊在十四岁那年还目不识丁，第一个拿到诺贝尔奖金的伦琴连中学也没有毕业。“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斯言是也。拉马克的女儿在自学成才的父亲 的纪念碑上刻下了这样两句话：“我的父亲，后代将要蔑

慕您……”是的，一切为人类作出不朽贡献的人们，都是值得后人羡慕的；但是，他们在创造的道路上备受艰辛、不屈不挠的精神，更值得后代所敬仰。

我们还可以进而认为，一个人取得成就的大小，往往与他碰到的磨难大小成正比例。科学家贝弗里奇说过：“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科学研究的艺术》，第147页）生活的历程是艰苦的，只要敢于正视那些磨难的挑战，昂首挺立于风浪之中，才能成为生活的强者。请看：病退在家的女青年曹南薇，身处恶劣的环境，自励自责，刻苦自学高能物理，发表了好几篇高水平的论文，被中国科学院录取为研究生；做过木匠的郑伟安，只有初中文化水平，靠自学读完了大学数学系全部专业课程，在一年半中完成四篇科学论文，一举推翻了国外《随机过程统计》中的两条德都定理。要是这两位青年在生活道路上一切顺顺当当，也许未必能实现退一步、进两步！

还是回到“人生就要进击”的题目上来。总之，不要一遇到沙漠，就怀疑生命绿洲的存在。更不要听说身上有癌细胞，就不准备活下去了。对于一个有志气的青年来说，学会在不利的环境中生活，是很重要的。我愿意再引述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里的几句话，与大家共勉：“大海越是布满着暗礁，越是以险恶出名，我越觉得通过重重危难去寻求不朽是一件赏心乐事。”（《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194页）

把追求的目标升高

人生在世，总是会有一点追求的。有的人怡然自安于盆栽小景般的个人小天地，有的人却以孜孜以求创造发明为乐，有的人爱从蝇头小利中寻求慰藉，有的人却以十万元遗产上交给国家为荣；有人提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一定要实现我的誓言，为造福人类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有人却什么也不想，但求平安度日，不要有一点风浪，如此等等。这可以说是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如果说，在平时，从一个人的追求中，可以看出他的人生目的如何；那么，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向往什么、追求什么，更是一个人生观的重要亮相。在这个问题上，高尚与卑下，伟大与渺小，可以说是一清二楚，泾渭分明。

在我最近读到的材料中，最令人感动的，则莫过于太原工学院化工系副教授栾菲在生命垂危时的追求了。这位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三十年来有过一段很不平凡的经历：他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冒着生命危险，从台湾投奔解放区。在山西大学学习时，曾被送到中共太原市委党校训练班学习，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尔后表现一直很好，被评为优秀团员、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工会积极分子、山西省技术革新者、全国科学普及工作积极分子。但是，在入党问题上，由于党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长期

存在着左倾错误，栾菲在党的大门外被整整考验了三十年。但是，栾菲对党的信念，象钢铁一样的坚强。他在患了癌症、生命垂危时，拉着前来看望他的党总支书记的手颤抖地说：“我追随党三十年，是党给了我理想和信仰……我多么想活着在党旗下宣誓啊，可是，时间不多了……在我有生之年再接受党的长期考验已经来不及了。我死后，请求组织审查我的全部历史和工作，我……”这是多么令人沧然涕下的一幕啊！栾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的不是要求组织上给他买什么好药治疗，也不是家事、后事的嘱托，而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这正如屈原所写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同样令人感动的是，在经过了十年内乱之后，我们又看见了宋庆龄、茅盾这样一些伟大人物，在弥留之际再次提出入党或者恢复党籍的崇高请求。请读一下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在他生命垂危之际，给党中央写的一封满怀深情的信：“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这是何等感人至深的一封信啊！这封信里的每一个字，都表达了茅盾同志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表达了他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坚贞而崇高的信念。从茅盾在弥留之际的追求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发呢？

当有人喁喁叹息“党的威信下降了”的时候，一生获得